

不负国宝，襄进学术

——陈寅恪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与阐发

荣新江

此前数十年的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确过多地依赖新材料，在追索新材料的同时，忘记了寅恪先生告诉我们的要思考新问题。实际上，敦煌写本大多数是属于写本时代的书籍和未经史家润色的原始文书，有着独特的文本性格，特别是不受“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士大夫文献的解构影响，正是今天跨学科研究的新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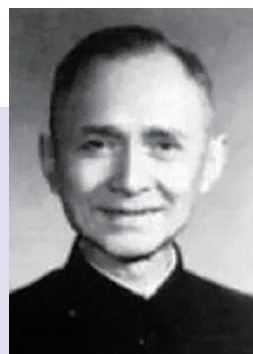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蒋天枢先生整理的《陈寅恪文集》，不仅有我们常见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还有把寅恪先生散篇文章汇集在一起的《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以及我们过去没有见过的《柳如是别传》，这对于当时如饥似渴读书的中古史、敦煌学的学子来说，是多大的恩惠！当时作为一名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我也囫圇吞枣式地仔细拜读寅恪先生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著作，虽然有不少文字看也看不懂。

200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集》，我因自身专业相关，且对寅恪先生始终怀有敬仰之情，接受了校对《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三部论文集的专有名词和全部史料的任务。寅恪先生撰写文章，通常是大段大段引用史料，旁及各种语言文字，核对一遍，着实不易。我尽量采用寅恪先生所用古籍的版本或中西文杂志的原刊本，保证不随便改一个字，也希望不让一个错字遗存。此前我就从邓广铭先生那里得知，蒋天枢先生整理寅恪先生文集时，是“老师的文字，一字也没有擅自改动”。小子何人，怎敢妄改，所动大概只有“獠”改回为“寮”，以及敦煌文书的编号误写等极少的地方。在核对过程中，对蒋天枢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益发崇敬，对《陈寅恪文集》编校水平之高由衷佩服。

如今上海古籍本《陈寅恪文集》已出版40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举办纪念会，要我就陈寅恪与敦煌学做个发言。这方面的话题，敦煌学界有不少文章发表，我自己也在一些相关敦煌学学术史的文章中有所讨论。对于此次纪念活动，我仅从三个方面，强调寅恪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以及阐释他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及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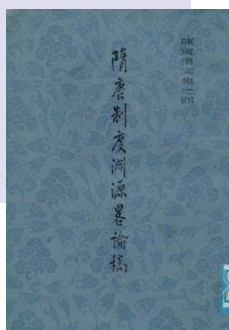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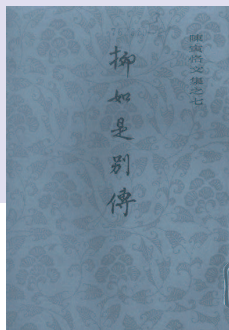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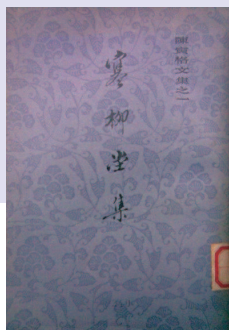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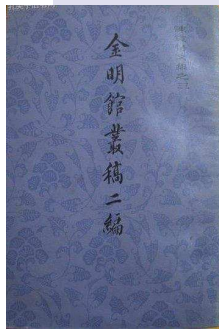


陈寅恪



蒋天枢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蒋天枢整理的《陈寅恪文集》(部分) ↓



明确提出“敦煌学”的概念

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开宗明义，提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敦煌学界都认为“敦煌学”这个名称是寅恪先生首创的，这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没有任何疑问。

可是到了1989年，对敦煌文书有精深研究的日本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发表一篇短文，题为《敦煌学与日本人》（《日本学》第13号；陈汉玉译载《国际汉学》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其中说到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早在1925年出版的《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中，就使用了“敦煌学”一词。池田温教

授也指出，大概是因为这本小册子是石滨先生在大阪怀德堂所作夏期讲演的印刷本讲义，所以流传不广。1998年方广钊发表《日本对敦煌佛教文献之研究（1909年—1954年）》一文（《敦煌学佛教学论丛》，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利用池田温教授文章的汉译本，认为石滨先生比陈寅恪更早地使用了“敦煌学”这一说法。2000年，王冀青发表《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一文（《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推测陈寅恪可能见到过石滨氏的小册子，他只是“敦煌学”一词的引入者，不是发明人。

不过，也是在1989年，姜伯勤先生发表《唐令舞考》一文（《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216页），曾据姜德明《书梦录》转引寅恪先生1944年所撰《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中的一段文字：“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

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现收入《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446页）由此可见，寅恪先生本人自认为“敦煌学”这个名字是他首创的。我相信寅恪先生是真的没有看过石滨纯太郎的讲义册子，所以他才会说这是自己的首创。遗憾的是，否定寅恪先生提出“敦煌学”概念的人没有看到寅恪先生的这段文字，也没有看到姜伯勤先生的阐述。

今天回过头来看，石滨氏的那个册子应当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流传，而寅恪先生创说“敦煌学”的文字是刊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样国际知名的刊物上，所有海内外文史研究者都必然知晓（可以挖出来）；而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是一部工具书，敦煌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都会时常翻阅。因此，从对于学科的影响和实际效果来说，寅恪先生当之无愧地是“敦煌学”这一学科概念的首创者。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宗教、历史、文学并关注民族语言文字

陈寅恪早年曾长期游学欧美，学习梵文、佛教等，旁及中亚古文字。回国后执教清华大学国学学院，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他写过一系列敦煌写本的跋文，如《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大多数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主要就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利用他所掌握的梵、藏、于阗、回鹘等文字资料，与汉文文献相发明，对中古思想、文体、史事等，多有阐扬，在敦煌学的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更能够反映寅恪先生对敦煌学的广括视野的文字，还是他写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其中历数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残篇故纸”，指出其“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其文曰：

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它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

（下转6版）➔